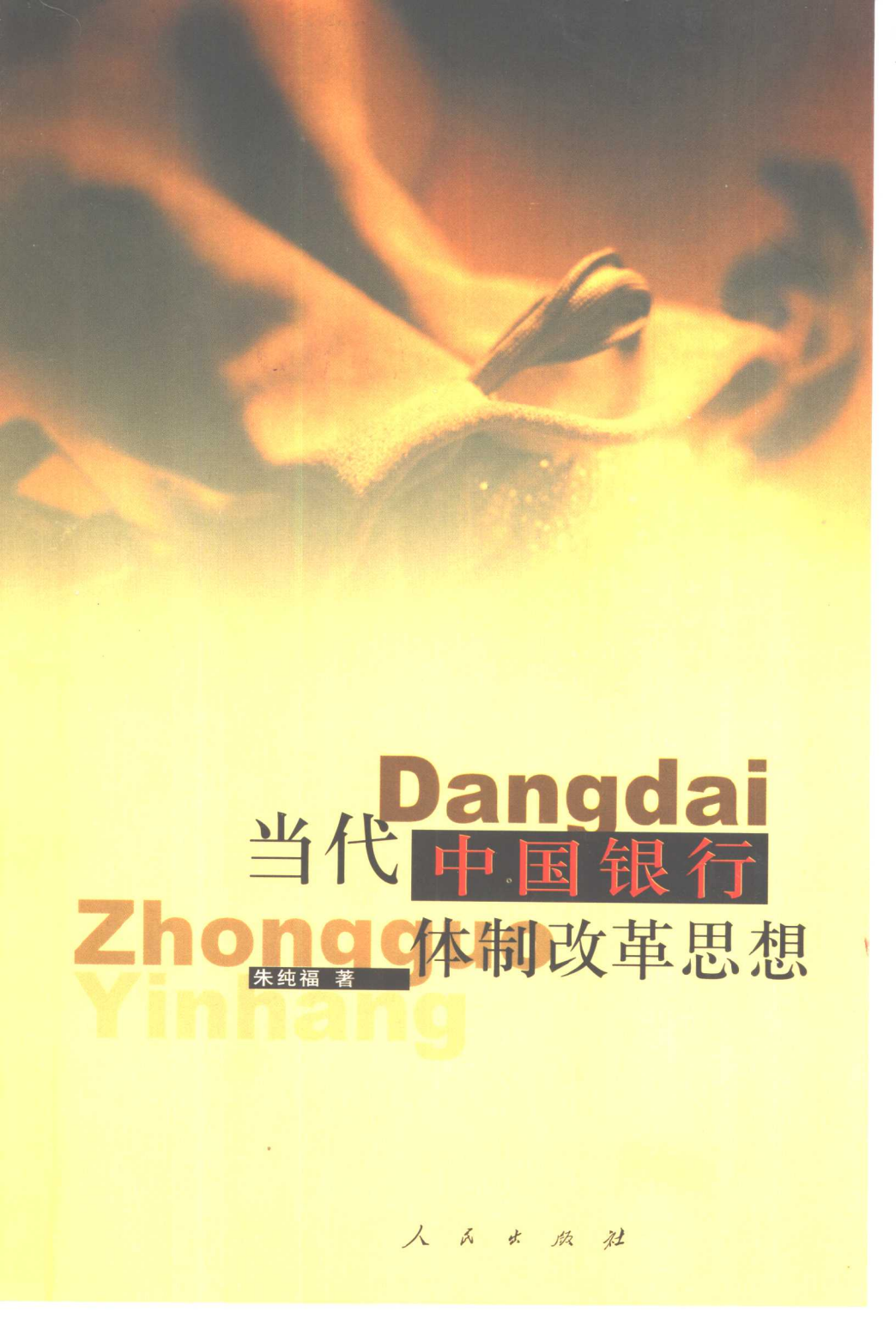




Dangdai
当代 **中国银行**
Zhongguo 体制改革思想
Yinhang

朱纯福 著

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银行 体制改革思想

朱纯福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魏海源

装帧设计:曹 春

责任校对:吴海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银行体制改革思想/朱纯福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

ISBN 7-01-003381-1

I. 当…

II. 朱…

III. 银行管理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IV. 83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8866 号

当代中国银行体制改革思想

DANGDAI ZHONGGUO YINHANG TIZHI

GAIGE SIXIANG

朱纯福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9.875

字数:234 千字 印数:1-4,000 册

ISBN 7-01-003381-1/F·747 定价:19.00 元

序

中国的金融机构历史悠久，而银行则是后起者。先有外商银行，以后才有中国本国的银行。

中国开始有外商银行是1845年。但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以内，中国原有的金融机构钱庄、银号、票号、账局等还是安于现状，没有一家将自己改组成为银行。直到1896年，才由督办铁路公司事务盛宣怀奏准创办银行，于次年5月成立了中国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用人办事，悉以汇丰为准”，完全以汇丰银行为楷模。这充分说明，中国本国银行业的兴起是学习西方银行制度的结果。

本国银行设立后，介绍西方银行制度的著作也陆续出版。1901年，湖北留日学生监督钱恂根据日本有关材料编成的《财政四纲》出版，其中有银行卷。银行卷介绍了各种性质的银行，指出中央银行“立于各银行之上”，是“银行的银行”。1910年留日回国学者谢霖、李激出版《银行制度论》，其中指出：“中央银行为一独立机关，不能与行政相混。不然则金融界既不恪尽其职，且未见其有济于行政。”

尽管在理论上早已明确中央银行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但中国的中央银行制度却难建立。清末的户部银行（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号称国家银行，但不是中央银行。北洋政府的国家银行有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家也不是中央银行。它们逐渐摆脱北洋政府的控制，而向商业银行的方向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8年在上海设立了中央银行,但有其名而无其实。在1934—1935年的金融危机中,国民政府乘机扩充其金融势力,建立起以四行二局为核心的金融垄断体系。抗战时期,官僚金融垄断势力加速发展。1942年5月进一步划分四行业务,由中央银行督促各银行交纳存款准备金,但存款准备金分存四行的办法没有改变。同年7月1日集中货币的发行,使中央银行成为国民政府统治区惟一的发行银行。1943年4月1日,财政部颁布《非常时期票据承兑贴现办法》,指定先在重庆、成都、贵阳、桂林、衡阳、昆明等19个地区施行。办法规定票据分为工商承兑汇票、农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三类,经背书后可以买卖或向中央银行请求重贴现,中央银行核定各银行重贴现的最高额,贴现率由中央银行公告。虽然这些都属于中央银行制度的发展,但距真正的中央银行要求还相差很远。而且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主要是实行金融垄断的机构,它完全附属于政府,推行恶性通货膨胀政策,为官僚资产阶级的聚敛财富服务,根本不是调剂金融的银行之银行。以上情况说明,旧中国本国银行的发展的半个世纪中,始终没有形成真正的中央银行制度。

另一方面,中国的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中,曾创造出突出的成绩。它的黄金时期是在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政府统治的初期。当时的商业银行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发展,有许多成功的经营管理经验。虽然旧中国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但作为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有相通之处。因此旧中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经验对今天仍具有借鉴作用,有必要进行研究和总结。

新中国成立后,在解放前开始建立的解放区的金融系统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全新的金融体系。这一新的金融体系是适应计划经济的要求而发展演变的,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

必须进行重大的改革。改革开放以来,金融理论界对金融体制的改革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产生了许多深刻的思想和理论。对这些思想和理论进行研究,分析其得失,使它们能更好地为现实的金融体制改革服务,是很有意义的。本书就是进行这一研究而取得的一个成果,但研究的范围不包括整个金融,仅限于银行体制的改革思想。

本书原是作者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学位论文。作者多年从事银行工作,有丰富的银行实际工作经验,对银行的情况和新中国建立以来银行制度的演变十分熟悉。他攻读的专业是经济思想史,于是用经济思想史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银行体制的改革思想,这样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作者广泛搜集有关文献资料,从中选取最有代表性的观点,以邓小平理论关于银行改革思想为指导,进行比较、分析,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本书的结构采取纵横结合,以时间为纵,以专题为横的模式,较全面地反映了二十多年来中国金融业的领导和金融研究者关于银行体制改革的各种理论和主张,以及银行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本书的写作是成功的。对当代的理论观点发表自己的意见难免有风险,因为有些问题还不一定能看得很清楚。作者敢于表明自己的观点,反映了理论探索的勇气。

我祝贺本书的出版,并乐为之序。

叶世昌于复旦大学

2000年10月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导论	1
1.1 研究银行体制改革思想的背景	1
1.2 当代银行体制改革思想的界定	15
1.3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	23
1.4 需要专门加以说明的若干观点	27
第二章 银行体制改革思想的阶段划分	40
2.1 银行体制改革发展阶段划分的比较和评价	40
2.2 中国银行体制改革二十二年四个阶段扫描	49
2.3 银行体制改革思想既有阶段性又有连续性	59
第三章 社会主义银行的性质与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65
3.1 社会主义银行的性质、地位和职能	67
3.2 建立我国中央银行制度	77
3.3 扩大银行信用活动范围	81
3.4 探索银行资金管理新办法	87
第四章 我国银行企业化改革方向	95
4.1 银行企业化改革思路	95
4.2 银行利率的杠杆作用	110
4.3 银行组织体系与发展战略	121
第五章 银行稳健经营与金融秩序	137
5.1 对抑制通货膨胀的认识	137

5.2 依法规范银行经营行为	147
5.3 探索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办法	170
第六章 中国特色的现代新银行体制	182
6.1 中国特色现代新银行体系框架	187
6.2 开放条件下的货币政策目标	204
6.3 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222
6.4 银行业务创新和技术现代化	256
第七章 对当代中国银行体制改革思想的思考	274
7.1 理论特点	274
7.2 理论缺陷	280
7.3 现实作用	287
7.4 历史影响	292
参考文献	297
后 记	305

第一章 导 论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银行体制改革与金融体制改革这两个概念是可以互换的,以后在外延上有了明显的广狭区别。除了专门研究非银行体制改革的金融理论文献之外,凡一般论述金融体制改革的往往以银行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银行体制改革思想在金融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中具有核心地位和作用,是金融体制改革思想发展的主流。

研究中国银行体制改革思想发展历程虽然不能穷尽金融体制改革理论发展的全部,但是确实无论在总结、反映已有银行体制改革理论成果还是为当前和将来中国乃至世界银行业的发展提供借鉴都是很有意义的。

1.1 研究银行体制改革思想的背景

中国银行体制改革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主体。首先提出并揭开银行体制改革序幕的是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在 1978 年 12 月 13 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要求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指出当时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① 在 1979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47—148 页,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年10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他明确提出,银行应该抓经济,现在仅仅是算账,当会计,没有真正起到银行的作用。要求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必须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①1991年,他在上海提出了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的观点,^②为中国金融业,从而也为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毫无疑问,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关于银行体制改革的重要思想,用以指导我国银行业跨世纪改革与发展的伟大实践,成为本文写作的一个重要动机。

中国银行体制改革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中国银行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历史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自觉反映。研究银行体制改革思想的实质是研究银行体制改革。这对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银行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西方国家银行业发达程度反差极大的是我国直到19世纪末才有银行,晚了几百年。^③而且是先有外国在中国设立的银行机构,过了半个世纪才有中国自己开办的银行。最早是1845年英国丽如银行(Oriental

① 尚明、陈立主编:《当代中国的金融事业》,第18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② 从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到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一着棋活,全盘皆活的科学论断,是当代中国金融事业改革与发展的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参阅《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③ 最早把英文 Bank 译为银行的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华英字典》的作者广东人邝其照。在汉字中,“行”比“店”大。广东有著名的“十三行”,而“银”则因为中国历来使用贵金属货币。他把经营货币业务,规模较大的机构译成“银行”。这一译法也被日本1872年发表的《国立银行条例》所沿用。参阅洪葭管主编《中国金融史》第168—169页,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Bank)在香港设立分行,以后又有德、日、俄、法、美等国银行相继开设。^① 还有一批外商银行的特殊形式中外合办银行,如华俄道胜银行、中法实业银行、中华汇业银行和中华懋业银行、上海银行等。^② 资

① Oriental Bank 按英文原意应译为东方银行,1845年在印度孟买的英、印合资的西印度银行(Bank of Western Indian)迁到英国伦敦并改为现名,同年在中国设立机构。当时各地有不同的名称。在广州称为银房,在福州称为东藩汇兑,在香港称为金宝。在上海的中文名称为丽如,后来逐渐统一起来,称为丽如银行,是外资银行闯入中国的“领头羊”,1892年倒闭。1851年英国政府颁给这家银行以皇家特许状,让它成为“特许银行”。它的分支机构除了在香港、广州、上海,以后增设于福州、汉口、厦门、天津和澳门等地外,还扩展到科伦坡、加尔各答、毛里求斯、墨尔本、悉尼、新西兰、爱丁堡和南非。1884年改组为新丽如银行公司,1892年破产倒闭。19世纪50年代相继设立汇龙银行(Commercial Bank of India)、阿加刺银行(Agra and United Service Bank Ltd)、有利银行(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London & China)和麦加利银行(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 China),全是英资银行。法兰西银行(Comptoir d'Escompte de Paris)是19世纪60年代设立的惟一非英资的外国银行。1865年(清同治四年)3月香港上海银行有限公司,后改为香港上海银行(Hong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即汇丰银行正式开业,并得到较快发展,与各国在华银行相比,长期处于优势地位,不但获利最丰,而且对旧中国的政治、经济产生的影响很大。汇丰银行至今仍是经营收益最好的跨国银行之一。进入19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银行独霸的局面被打破。先后设立了德国德华银行(Deutsche-Asiatische Bank)、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沙俄华俄道胜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Bank de L' Indo-chine)和美国花旗银行(The International Banking Corp New York)等。参阅洪葭管主编《中国金融史》第145—163页,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孙晓村主编《外商银行在中国》,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华俄道胜银行由俄法中合资,原总行在彼得堡,俄十月革命后迁法国巴黎,1896年在上海设分行,1926年停业。中法实业银行,中法合资,总行在巴黎,1913年在上海设立分行,1921年停业。中华汇业银行,中日合资,总行在北京,后迁天津,1918年设立,1928年停业。中华懋业银行,中美合资,总行在北京,1920年设立,1929年停业。上海银行,中日合资,总行在上海,1918年设立,1945年被中国接收。

本主义国家银行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外国银行在华势力的扩张，激发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和上层官僚产生兴办银行的思想。^①

中国自办的第一家银行是 1897 年设立的中国通商银行。^② 1905 年户部银行成立，1908 年改为大清银行，^③ 1912 年大清银行经清理后改组为中国银行。1907 年建立交通银行。此外，信成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等纯粹私人资本银行也相继成立。

20 世纪初叶大战期间及战后，帝国主义国家相互厮杀，自顾不暇，放松了对中国的控制，被称为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民族工业对资本的需求以及从事政府放款和公债投机，为商业银行发展带来有利条件。据统计，1912 年设立银行 14 家，

①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介绍英国银行制度。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兴银行”的建议。光绪十三年(1887 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和美商米建威订约合办华美银行，但被慈禧下旨禁止。郑观应和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等人人都为建立中国资本主义银行作了舆论宣传。梁启超在 1909 年撰写《中国改革财政私案》，其中有《银行政策》一节。他认为“银行为国民经济之总枢纽，所关者不徒在财政而已。”康有为在 1913 年借鉴国外银行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提出建立银行体系的设想。

② 1897 年 5 月，任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总办的盛宣怀经清政府批准设立中国通商银行，总行设在上海。最初英文名为 The Imperial Bank of China，1912 年改为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从中反映出辛亥革命带来的时代变迁。该银行组织完全模仿汇丰银行，并聘请曾在汇丰银行任职的英国人美德伦为经理，当时称为“洋大班”，另有中国人任买办，后改称为“华大班”。用英文记账，加入外商银行同业公会，成立后第二年开始发行银行券。

③ 中国通商银行建立后，清政府根据户部奏折，参考各国银行章程，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八月在京师成立户部银行总行，在天津、上海设立分行。三十四年(1908 年)正月改名为大清银行，增资 1 000 万两，分为 10 万股，由国家认购 5 万股，其余限本国人购买。

至 1927 年共设立银行 185 家,其中 1917 年至 1923 年共设立 131 家。^① 这是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银行业快速发展时期,到 30 年代,银行密集上海成为中国和远东的金融中心。

审视近现代中国银行业的历史,有不少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历史比西方国家晚得多,既有起步较迟的不利因素,又有借鉴别国经验的后发条件。关键是如何扬长避短,建立本国银行的优势。如果把建立于 1897 年的中国通商银行与建立于 1694 年的英国英格兰银行作为比较,时间上足足晚了二百多年。中国银行业与外国银行差距很大,无论是外部经营环境还是本身的资本实力、经营方式和管理手段都比较落后,但是中国银行业一开始就是仿照西方银行体制,借鉴各种成功经验,从而逐步替代传统的钱庄、票号而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主体。这种时间差距产生的影响具有长期性,致使当今和以后相当长时间,学习和借鉴国外银行先进管理技术仍是我国银行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对此要有清醒认识和充分估计。

近代中国银行业的产生和发展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性质,与世界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形势密切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重建,给中国民族工业包括银行业一个难得的发展机会。这是所谓势使之然。从国内社会经济基础分析,经过洋务运动^②以及有关变革,带有很强垄断性质的官办工业、官商合办工业和要

① 这是杨荫溥《五十年来之中国银行业》一文中的统计数字,参阅中国通商银行编《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第 41 页,1947 年版。此外还有设立年月不明的银行未统计在内。

② 鸦片战争后,列强对中国的严重威胁,迫使清统治者接受一些知识分子的建议,在同治至光绪年间实行学习西方政策。咸丰末年至光绪二十年(1894 年)甲午战争为洋务运动时期,也是中国近代工业和近代货币银行制度的萌芽时期。

求自由竞争并逐步占重要地位的商办企业,给中国经济植入许多资本主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对封建主义经济起到了加速分化瓦解的作用。因为当时中国经济基础的变动主要是在工业、交通和商业贸易方面,农村则仍处在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严重桎梏之中。所以中国银行业是以城市为依托,主要服务于中国的工业,包括采矿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对外贸易。北洋政府是迫使银行对政府贷款和滥发公债的始作俑者,以后被国民党政府所沿袭,由此加重了银行信用危机。银行为获得较高回报而从事过度投机活动会对银行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①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社会政局动荡,政府不断更换,导致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银行难以抵挡得住高利的诱惑和权力的压迫。也有一些银行是专门为投机公债而设立。每到政府债信破产或时局变化,许多银行就先后倒闭。

近代中国已形成以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主体,国家银行为主导,其他银行并存的银行体系。属于国家银行的最初有中国银行、交

^① 北洋政府自 1912 年至 1926 年共发行了 27 种内债,发行额达 876 792 228 元,实际发行额为 612 062 708 元。此外还有各种国库券、盐余借款、垫款、透支等。由于政府借债,利息高,折扣大,又有总税务司保证还本付息,比任何放款都要优越,所以当时银行都做这项业务,专为从事公债投机而设立的银行不下三四十家。但是,北洋政府时期时局如走马灯,政府倒台,借款无法收回,银行倒闭者接踵。“京钞风潮”亦称为“中交两行停兑风潮”,虽然并非投机公债的原因,但也说明政局动荡必然影响银行信用。1916 年 5 月北洋政府为袁世凯筹备帝制及镇压讨袁军大量动用中国、交通两行的现钞准备,为增加发行量,下令中国、交通两行纸币停止兑现。但除北京、天津、济南等地外,其他地区并未认真执行。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总经理的张嘉璈拒绝执行停兑命令,在其他银行的支持下渡过挤兑难关,赢得了社会信誉,体现了张的卓识和勇气,为世人所器重。直到 1921、1922 年,中、交两行才分别恢复兑现。

通银行,以后发展成所谓“中、中、交、农”四大国家银行,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此外就是各省的地方银行,受地方军政势力控制,成为各地军阀谋求私利的工具,几乎没有一家办得好的。在银行业中成为主体力量的是商业银行,主要以“北四行”、“南三行”为代表^①。所以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国家银行和商业银行,就银行资本构成性质来说,都是股份制银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银行有较大的独立性。但是国民党政府奉行金融垄断政策,国家银行在几次扩股后,增加了官股比重,日益被国民党政府所控制,成为政府和“四大家族”控制经济命脉和敛财的重要工具。不仅中断了中国、交通两行的商业化进程,而且南三行和北四行的继续发展也被延误。

近代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布局很不平衡,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大都市。金融中心先是在北京、天津,但是由于历史和地理位置等多种因素,30年代,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的总行或总管理处,相继由北方迁到上海。到1935年,全国27家重要银行的42亿元存款总额中,上海一地据估算即占47.8%。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为银行业提供了便利的

^① 北四行指:盐业银行,1914年10月成立,总行在北京;金城银行,1917年成立,总行设在天津;大陆银行,1918年9月成立,总行设在天津;中南银行,1921年6月成立,总行设在上海。南三行指:浙江兴业银行,1907年9月成立,总行设在杭州,1915年将杭州总行改为分行,上海分行改为本行,1923年上海本行改为总行,从1918年至1927年曾五度位居全国商业银行的首位;浙江实业银行,1923年建立,总行设在上海;上海商业银行,简称上海银行,1915年成立,总行在上海,由于成立时规模很小,曾被称之小小银行、小上海银行,但至1926年已跃居全国主要商业银行的第五位。1931年,成立于1914年的新华信托储蓄银行从北京迁到上海,简称新华银行,与北洋政府时期的“南三行”合称为“南四行”。

经营条件,银行业的积极参与促进了上海金融市场的繁荣和发展。各地利率、汇率及其他金融行市以上海行市为基准,上海发挥了金融中心的辐射作用。上海不仅成为国内最大的金融中心,而且也是远东的国际金融中心。^①

近代中国银行业在复杂的经营环境中,为增强竞争能力,创造了同业合作的经验。1917年北京银行同业公会成立,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发起于1915年,正式成立于1918年;分别发行会刊《银行月刊》和《银行周报》。北四行是北方的金融集团,南三行是南方的金融集团。集团之间、行与行之间既相互竞争,又重视相互协作。当一家银行有支付和其他经营困难时,会得到别的银行帮助。北四行联合经营,在中国金融史上具有开创的意义。1921年11月,盐业、金城、中南三行在天津、北京、上海成立联合营业事务所。按照《三行联合营业规约》,联合营业范围以不损害各行各业营业为限。1922年7月大陆银行也加入联合经营。建立四行准备库,

① 上海成为近代中国和远东金融中心,得力于几次大的发展机遇。1843年上海港被迫对外开放,1845年开辟租界,上海很快超过广州而成为全国最大的货物集散地和金融业务中心之一。19世纪五六十年代,太平天国军队东进后,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开始聚集上海,江浙巨贾、富绅投资钱庄,促进了钱庄业的发展。七八十年代,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欧洲—中国海底电缆的铺设,中国对外贸易条件起了较大变化,上海确立了内外贸易的枢纽地位,为银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经济环境。20世纪初,一批银行在上海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稍后几年,上海银行业得到迅速发展。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不仅由于上海金融业支持了蒋介石政权,而且也由于上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银行业获得空前繁荣。即便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也由于上海租界“孤岛”的特殊条件,在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都有自由活动的空间,一度出现兴旺景象,以至上海有所谓“东方的纽约”之称。参阅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室编《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第17—22页,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

共同发行中南纸币；成立四行储蓄会，进行联合放款。还聘用英国会计师进行稽核，每月公布账目，树立了中南银行纸币信誉。北四行股东之间互为投资，互相兼职，是实现联合经营的先决条件。这种为克服各自资本实力不足、难以与外资银行竞争的弱点，在发展中国金融事业上求大同存小异，既竞争又有合作，创造了联合经营的成功经验，对今天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与发展仍有借鉴价值。

近代中国银行业涌现了一批具有远见卓识和实干精神的银行家。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与这些银行的创立者的素质和敬业精神密不可分。他们多数受过高等教育，不少人还留学国外，掌握了西方金融知识，成为中国金融现代化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比较杰出的人物有中央银行的宋子文，中国银行的张嘉璈、宋汉章，交通银行的钱新之，金城银行的周作民，大陆银行的谈荔孙，盐业银行的吴鼎昌，浙江实业银行的李铭，浙江兴业银行的叶揆初，上海银行的陈光甫，四明银行的虞洽卿，聚兴诚银行的杨燦三等。他们处在国难深重，社会政治动荡年代，不放弃任何有利机会，在政府控制和同业竞争中艰苦创业，表现了出色才干。由于江浙财团在经济上支持了南京政权，张嘉璈、钱新之、陈光甫、李铭、虞洽卿等人后来都在国民党政府各部门中担任了要职。而同蒋介石政府保持距离的叶揆初和浙江兴业银行则受到排挤和打击。^① 人物命运是时代历史的反映，从这批中国第一代银行家的浮沉中可以得到许多启发。

叶世昌认为，解放前中国的银行业已有了相当发展。一些商业银行的成功的经营管理经验值得重视。解放后因其资本主义性

^① 关于中国近代银行业的情况可参考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第六章至十章的内容，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